

生计风险感知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影响

林 婷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3)

摘要: 以江西省赣州市龙岗村和火燃村的202份农户样本为例,在构建农户生计风险感知量表和参与意愿量表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同时以农户个体基本特征为调节变量,把农户划分成为新、老农户,进行多群组分析。结果表明,发展风险感知、生产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共同构成了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三者显著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农户个体基本特征对其参与意愿存在调节效应。基于此提出政策建议,以有效推动农户实现生计可持续。

关键词: 生计风险感知; 乡村旅游; 参与意愿; 多群组分析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02-0164-06

在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是农村稳定与繁荣的基础。然而,从现实状况来看,农户群体多以农业为生活依托,容易遭受各种风险的冲击,这是当下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的难点所在。乡村旅游作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有效手段,是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1]。推动资源禀赋良好的乡村因地制宜推动旅游建设,鼓励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是促进旅游富农的题中之意。

近年来,农户生计风险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话题。当前生计风险研究围绕着生态脆弱区^[2]或脱贫地区^[3]生计风险的评估、分类、应对策略展开,缺乏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特征与来源的全面认识。此外,风险感知来源于当地环境,根植于当地的生计系统,已有研究难以有效揭示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农户的风险感知及其对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第一,通过实地调研,客观真实地反映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现状和参与乡村旅游意愿,同时深入把握生计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第二,引入个体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探索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与参与意愿的差异;第三,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建议以提升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意愿,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

1 文献回顾

1.1 生计风险与生计风险感知

农户生计风险是指赖以生存的各类资产遭受

损失的概率^[3],这会导致农户收支变化,致使其无法实现生计的可持续。Zeng等^[4]将农户生计风险划分为健康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并认为增加非农收入、发展乡村旅游等是有效的风险抵御策略。余汝艺和梁留科^[1]则进一步发现政府支持是脱贫旅游地旅游农户抵御风险的关键因素。

风险感知是个体对外在客观风险的主观评估和感受,属于一种经验性认知^[5]。研究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有助于提升其风险应对能力,进而实现农户生计的可持续。苏芳等^[6]基于生计资本的划分将生计风险感知划分为健康风险、环境风险、金融风险、社会地位和人际网的缺失、信息风险,此后研究多借鉴这一分类方法。穆炳男等^[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户风险感知概括为经济、社会、心理、生态四个类型,发现四者间接影响农户的生计抉择。

1.2 乡村旅游参与意愿

农户参与是乡村旅游中的一部分,对乡村旅游发展有着决定作用。参与方式、参与作用、参与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是国内外的研究重点。Rasoolimanesh等^[8]将参与划分为强制型、诱导型、自发型三种。刘荣等^[9]发现参与旅游能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也能提高农户的适应力。娄志强等^[10]发现主观层面上的劳动技能水平,客观层面上的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土地空间是影响农户乡村旅游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10]。

当前国内外有关话题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特定区域农户的风险应对策略研究。有关风险感知

收稿日期: 2024-08-19

作者简介: 林婷(1999—),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旅游。

的研究多从生计资本的视角对生计风险感知进行划分,未能考虑到乡村旅游地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的特殊性,更缺乏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这一抵御风险策略意愿的研究。据此,本文将尝试探寻生计风险感知对农户乡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以拓展农户生计风险感知与个体行为意愿的相关研究。

2 研究假设

风险感知是探寻个体行为决策规律的重要依据。农户是理性的,大都具有风险规避与抵御意识,能够进行风险管理。换言之,当农户感知到某种不确定性的损失存在时,往往会寻求降低风险感知程度的方法,产生规避、降低或者转移风险的行为意愿。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越强,其寻求抵御风险的意愿越强^[11]。农户感知到旅游发展可能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和非农生计,参与意愿自然会增强。本文在现有数据分析基础上,以个体发展风险感知、生产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来表征生计风险感知,并提出以下假设。

H1:农户的发展风险感知能够显著正向地影响其参与乡村旅游意愿;

H2:农户的生产风险感知能够显著正向地影响其参与乡村旅游意愿;

H3:农户的社会风险感知能够显著正向地影响其参与乡村旅游意愿。

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情况等是农户的个体基本特征。与老一代农户相比,新一代农户在时代巨变之中形成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性格特征^[12]。这正是因为新一代农户在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历经了诸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港澳回归等重大事件。本文将1979年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农户视为老一代农户,1979年后出生的视为新一代农户。乡村旅游地新一代农户的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其对乡村旅游相关政策更加了解,因而新一代农户参与

乡村旅游的意愿可能更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个体特征对“生计风险感知→参与意愿”具有调节作用,即相对于老一代农户群体:

H4a:新一代农户的发展风险感知能够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参与意愿;

H4b:新一代农户的生产风险感知能够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参与意愿;

H4c:新一代农户的社会风险感知能够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参与意愿。

根据研究假设构建生计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的概念模型(图1),其中,生计风险感知由发展风险感知、生产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三个公因子组成。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本文基于既有研究基础,结合专家意见对调查问卷进行设计及修正完善。①生计风险感知量表。在借鉴苏芳等^[6]和陈建新^[13]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生计风险感知量表进行设计,共计22个题项。②参与意愿量表。为了更为精确地测量农户的参与意愿,并兼顾农户的理解程度,参考杨丹丹和蒋作明^[14]的做法,对农户的参与意愿进行衡量。③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

3.2 案例地概况

选择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乡村振兴项目重点村龙岗村和火燃村为主要案例地。二村毗邻而存,地处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南麓,距离市区均不足10 km,乡村旅游辐射带动效应明显。龙岗村以“花田小镇”项目为依托,以“项目+农户”的模式鼓励贫困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引导农户参与小镇运营,带动脱贫户月均增收2 800元。龙岗村花田小镇先后获评全国100个乡村旅游精品景点,江西省AAAA级乡村旅游点等荣誉称号。火燃村采取“美丽乡村+旅游+企业+合作社+农民”的模式,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以富硒农业为依托,带领农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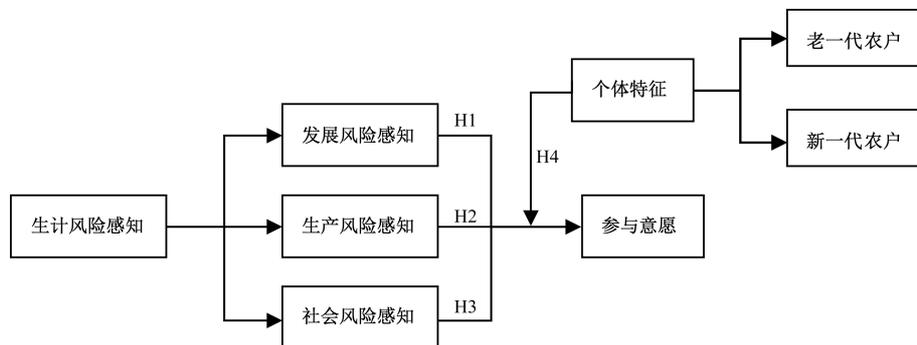


图1 概念模型

开发蘑菇宴、蘑菇科普等特色文旅项目,带动村民年均增收 2 000 元以上。火燃村先后获评全国美丽乡村、江西省 AAA 级乡村旅游点等荣誉称号。

龙岗村和火燃村是广大乡村旅游地振兴发展的一个缩影,能够较好地反映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感知下旅游参与意愿及其内在影响机理,符合本文的研究主题。调研人员采取随机拦访和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调查了 220 户农户,删除无效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202 份,回收的有效率为 91.82%。

4 结果与分析

4.1 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性别上,女多男少,分别为 55.9%和 44.1%,这符合农村家庭成年男性外出务工,女性在家照顾家庭的特征。年龄上,1979 年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户,即 43 岁以上的占比为 40.6%,1979 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户,即 18~43 岁的占比为 59.4%。在健康状况上,88.6%的受访者健康状况为良好,具有正常的劳动能力。在受教育程度上,受访者为初中学历的占 33.7%,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略低于初中学历的受访者,占 29.7%,小学及以下学历、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比例相当,约为 18%,说明从整体来看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庭平均月收入在 3 001~5 000 元的受访者比例最高,达 39.1%,3 000 元以下的占比为 30.2%。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 SPSS26.0 分别对生计风险感知和参与意

愿两个量表的测量题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生计风险感知整体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结果显示 KMO 为 0.902,巴特利球形检验值为 976.797, $P < 0.01$,适宜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将因子载荷低于 0.5、因子对于题项数少于 2 等作为标准删除不符合要求的题项,最终析出由 11 个题项构成的 3 个公因子,总解释方差占比为 67.297%。根据因子载荷矩阵,将 3 个公因子依次命名为发展风险感知(DRP)、生产风险感知(PRP)、社会风险感知(SRP)。生计风险感知(LRP)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9,其中 DRP、PRP、SRP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 0.824、0.799、0.803,表明因子内部一致性较强。参与意愿量表的 KMO 为 0.793,巴特利球形检验值为 271.608, Cronbach's α 为 0.817,说明参与意愿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生计风险感知量表中,新、老农民在生计风险感知各维度的均值得分均在 3 分以上,表明受访者的整体风险感知水平较高。两代农户的发展风险感知均值得分最高,均大于 3.8,其次为生产风险感知,得分分别为 3.773、3.690,最后则为社会风险感知,得分分别为 3.399、3.027,这表明受访农户对个体的发展问题较为担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社交网络缺失方面的问题。参与意愿量表均值得分分别为 3.760、3.530,表明受访农户整体参与乡村旅游意愿较强,能够充分感知到参与乡村旅游能够有效抵御生计风险。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

题项/维度	Cronbach's α	因子载荷	解释方差百分比/%	KMO/Bartlett's 检验	均值(老/新)
发展风险感知(DRP)	0.824		24.306	0.902/976.797	3.845/3.951
自己或家人患病(DRP1)		0.717			3.920/4.079
子女学费高(DRP2)		0.664			3.460/3.796
子女就业困难(DRP3)		0.794			3.760/3.921
自己或父母养老保障困难(DRP4)		0.761			4.240/4.007
生产风险感知(PRP)	0.799		21.914		3.690/3.773
农作物病虫害(PRP1)		0.687			3.680/3.750
耕地菜地质量下降(PRP2)		0.797			3.780/3.783
附近水域水质下降(PRP3)		0.562			3.620/3.783
农产品价格波动大(PRP4)		0.769			3.680/3.776
社会风险感知(SRP)	0.803		21.077		3.027/3.399
与朋友或邻居关系变差(SRP1)		0.778		3.080/3.322	
村里治安变差(SRP2)		0.792		3.240/3.599	
困难时期获得外界帮助变少(SRP3)		0.803		2.760/3.276	
农户参与意愿(WILL)	0.817		64.689	0.793/271.608	3.530/3.768
愿意学习关注乡村旅游知识(WILL1)		0.800			3.600/3.796
愿意为旅游发展提供劳力物力(WILL2)		0.840			3.360/3.645
愿意为乡村旅游发展建言献策(WILL3)		0.740			3.460/3.750
愿意为本村乡村旅游进行宣传(WILL4)		0.829		3.700/3.882	

4.3 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表1可知,4个潜变量对应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说明各观测变量均可接受。生计风险感知量表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对应的推荐值指标,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具体如表2所示。

由表3可知15个可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Std.)数值为0.612~0.842,均大于0.6的阈值条件,说明这些题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同时,4个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AVE)均大于0.5,且其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说明数据的收敛效度理想。以上指标符合要求,证实了本研究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较好。

基于前述分析,运用AMOS26.0构建了生计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运行结果显示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数理想, $\chi^2/df = 1.089 < 3$, $RMSEA = 0.021 < 0.08$,模型达到普通适配标准;简约适配指标 $PNFI = 0.752$, $PGFI = 0.660$,结果均大于0.5;增值适配指标 $CFI = 0.995$, $NFI =$

0.940,由此可以判定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具体如表4所示。

4.4 假设检验

4.4.1 主效应检验

根据研究模型,主效应路径关系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H1、H2及H3均通过检验。其中,发展风险感知与参与意愿的T为2.654,标准化系数为0.322,其在 $P < 0.01$ 的水平下显著;生产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与参与意愿的T分别为3.446和3.303,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98、0.226,其均在 $P < 0.001$ 的水平下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发展风险感知、生产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乡村旅游参与意愿。

表5 生计风险感知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主效应路径关系检验

假设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T	结果
H1:DRP→WILL	0.322**	2.654	成立
H2:PRP→WILL	0.398***	3.436	成立
H3:SRP→WILL	0.226***	3.303	成立

注:**、***分别表示5%、1%的显著性水平。

表2 量表结构效度检验结果

指标	χ^2/df	RMSEA	NFI	RFI	IFI	TLI	CFI	PCFI	PNFI
推荐值	<3	<0.1	>0.80	>0.80	>0.90	>0.80	>0.80	>0.50	>0.50
实际值	1.228	0.034	0.950	0.932	0.990	0.987	0.990	0.738	0.708
结果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表3 量表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观察变量	Std.	标准误	T	SMC	CR	AVE
发展风险感知	DRP1	0.773	—	—	0.598	0.828	0.546
	DRP2	0.757	0.092	10.698	0.573		
	DRP3	0.676	0.098	9.452	0.457		
	DRP4	0.746	0.091	10.519	0.557		
生产风险感知	PRP1	0.737	—	—	0.543	0.805	0.510
	PRP2	0.639	0.108	11.156	0.408		
	PRP3	0.793	0.094	12.325	0.629		
	PRP4	0.679	0.099	9.093	0.461		
社会风险感知	SRP1	0.650	—	—	0.423	0.815	0.599
	SRP2	0.842	0.121	9.339	0.709		
	SRP3	0.815	0.110	9.206	0.664		
参与意愿	WILL1	0.746	—	—	0.557	0.818	0.532
	WILL2	0.805	0.106	11.254	0.648		
	WILL3	0.612	0.100	8.434	0.375		
	WILL4	0.740	0.102	10.313	0.548		

注:Std.为标准化因子载荷;SMC为多元相关平方。

表4 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模型	简约适配指数			增值适配指数			绝对适配指数		
指标	χ^2/df	PNFI	PGFI	IFI	CFI	TLI	NFI	GFI	RMSEA
推荐值	<3	>0.5	>0.5	>0.9	>0.9	>0.9	>0.9	>0.9	<0.08
拟合值	1.089	0.752	0.660	0.995	0.995	0.993	0.940	0.943	0.021
结果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4.4.2 调节效应检验

从表 1 可知,从整体来看,新一代农户的题项得分均高于老一代农户,因此能以农户身份作为调节变量对样本数据进行多群组分析。将 $T > 1.960$ 、 $P < 0.050$ 作为检验路径显著性的标准。基于模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在发展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方面,老一代农户的发展风险感知对农户乡村旅游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则 H4a、H4c 并未得到支持。在发展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方面,新一代农户的发展风险感知对农户乡村旅游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则 H4b 得到支持。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风险感知视角,构建农户生计风险感知量表与参与意愿量表,并以个体特征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户基于个体生计风险感知所形成的参与意愿的差异。

(1) 生计风险感知主要是由发展风险感知、生产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 3 个维度的因子构成。这与苏芳等^[6]、穆炳男等^[7]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已有研究多从生计资本视角出发划分生计风险,人力资本对应为健康风险、物质和金融资本对应为金融风险、社会资本对应为社会风险、自然资源对应环境风险。然而,由于对信贷政策理解不足、乡村旅游地生态环境良好等原因,农户对金融风险和环境风险的感知水平并不显著。鉴于此,将乡村旅游地农户面临的风险分为发展风险感知、生产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感知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2) 生计风险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乡村旅游参与意愿。通过模型主效应路径检验,发现生产风险感知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发展风险感知对农户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次之,社会风险感知的影响最小。这表明农户能够充分认识到参与乡村旅游是有效抵御风险的策略。这也能够佐证农户对于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感知明显,如提高经济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与外界的沟通和邻里团结等。

(3) 农户个体特征在生计风险感知与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意愿之间具有部分调节作用。具体来说,相较于老一代农户来说,新一代农户感知到的生产风险对其参与乡村旅游有意愿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可能原因在于,与老一代农户相比,新一代农户作为家庭支柱,承担着家庭的主要经济责任,故而对于和家庭经济收入密切相关的生产风险感知更加强烈。从而在生产风险感知出现某种程度的增长时,迫切寻求降低生产风险的生计策略,其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也会有更大幅度的提升。然而,与假设相反的是,老一代农户感知到的发展风险与社会风险对其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正向影响程度大于新一代农户。根据调研可知,老一代农户的保险意识相对较弱,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新型城乡医疗合作保险并不能很好地为农户解决养老和大病医疗问题,故而更加愿意通过参与乡村旅游来降低发展风险。此外,“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农村老一代农户的乡土情结更加浓烈,对于邻里关系更加注重,当其感知到将来获得外界帮助的风险可能减少或者与邻里关系变差时,更加愿意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增强与外界的连接与改善邻里关系。

5.2 建议

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本文将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1) 要充分发挥村集体的优势,与农户共享旅游发展红利,提升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意愿。一是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人力优势和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促进本村旅游发展的模式,加强村集体与社会资本的合作,由村民和村集体按股分红,壮大集体经济;二是发挥模范典型的作用,鼓励从乡村旅游中发展受益的农户分享经验,吸引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三是发挥村党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落实响应旅游决策与部署。

(2) 构建完善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引导农户主动关注本村乡村旅游发展相关信息,切实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决策、教育培训、管理经营、宣传营销、利益分配等过程之中,促进农户参与意愿向参与行为的实质性转化。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整体的乡

表 6 生计风险感知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多群组分析检验结果

假设路径	估计值		T		P		结果
	老一代	新一代	老一代	新一代	老一代	新一代	
H4a:DRP→WILL	0.338	0.307	2.491	1.967	0.013	0.049	不成立
H4b:PRP→WILL	0.407	0.479	2.658	2.755	0.008	0.006	成立
H4c:SRP→WILL	0.238	0.178	2.427	2.285	0.015	0.022	不成立

乡村旅游参与意愿较高,但是受自身知识水平与能力、信息缺失、权力不足、资本缺乏等因素的阻碍,无法将参与意愿转为实际行动。故而,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参与机制,让更多的农户都吃上“旅游饭”。

(3)在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开发工作中,切实完善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与帮扶政策,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保驾护航。当前,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对此,一是建立起完善的参与风险预案,妥善解决农户参与乡村旅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难题与困境;二是建立起完善的帮扶与支持政策,为有明显意愿参与乡村旅游的农户提供信息、资金、技术、政策等扶持;三是立足全局和长远,对本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坚守生态和人文底线。

参考文献

- [1] 余汝艺, 梁留科. 脱贫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及管理策略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3, 39(2): 250-256.
- [2] 赵旭, 向恒星, 赵菲菲. 长江流域生态退捕渔民生计脆弱性评价及生计风险预测 [J]. 生态学报, 2024, 44(5): 1854-1867.
- [3] 左停, 苏武峥, 赵梦媛. 提升抗逆力: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生计系统“风险-脆弱性”应对策略研究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4): 129-136.
- [4] ZENG X, GUO S, DENGX, et al. Livelihood risk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farmers in earthquake hazard threatened areas: evidence from sichuan province,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1, 53: 101971.
- [5] 张书维, 刘星, 汪彦. 目标框架对居民社区安全合作生产意愿的影响: 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 [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4(4): 5-20.
- [6] 苏芳, 殷娅娟, 尚海洋. 甘肃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9, 39(6): 191-197.
- [7] 穆炳男, 付锦秀, 陈珂. 自然保护区与农户生计抉择: 基于风险感知视角 [J]. 林业经济, 2023, 45(11): 5-27.
- [8] RASOOLIMANESH S M, JAAFAR M, AHMAD A G, et 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World Heritage Sit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58: 142-153.
- [9] 刘荣, 许建波, 王露露, 等. 参与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54(4): 650-664.
- [10] 姜志强, 张洋洋, 张丹丹, 等. 乡村旅游发展中农民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平顶山市宝丰县龙王沟为例 [J]. 中南农业科技, 2023, 44(10): 112-115.
- [11] 罗磊, 傅新红, 刘宇炎, 等.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数字素养与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基于柑橘种植农户调查数据分析 [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2): 56-72.
- [12] 刘炎周, 王芳, 郭艳, 宋得浪. 农民分化、代际差异与农房抵押贷款接受度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9): 16-29.
- [13] 陈新建. 感知风险、风险规避与农户风险偏好异质性——基于对广东适度规模果农风险偏好的测度检验 [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85-91.
- [14] 杨丹丹, 蒋作明. 农户乡村旅游影响感知与参与意愿研究——以岳西河南村为例 [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9(1): 23-30.

Impact of Perceived Livelihood Risk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LIN Ting

(Shenzhen Tourism College of Jina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3,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aking 202 samples of farmers from Longgang Village and Huoyuan Village in Ganzhou,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scale of farmers'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and the scale of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at the same time, basic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were used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classify the farmers into new and old farmers, and to carry out multi-cohort analy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ception of development risk, production risk and social risk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perception of livelihood risk of farmers, and all three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and there is a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farmers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Based on thi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or farmers.

Keywords: perceived livelihood risk; rural tourism;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multi-cluster analysis